

今年居民增收难跑赢 GDP 收入分配改革被寄厚望

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的信息,无论是扩大国内需求还是力保民生,问题的核心都落在收入分配调整上。这个汇聚宏观经济若干难题的焦点问题虽然久拖不解,但是中国已经没有退路。如何在收入分配改革这个老大难问题上取得突破尤其值得探讨。

居民增收或难跑赢 GDP

12月9日,被认为是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把“扩大内需”放在突出位置,明确强调要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完善促进消费的政策,努力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

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不振一直是中国的一个短板。在即将过去的2011年,面对萎靡的国外消费,被寄予厚望的国内需求也同样处于萎靡状态。经济学者指出,内需萎靡的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存在重大扭曲。

反映贫富差距状况的常用指标为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基尼系数0.4应为一条预警线,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社会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况。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王小鲁认为,由于相当数额的灰色收入没有被计入在内,再加上目前公布的统计数据可能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出入,中国实际的基尼系数可能已经高于0.5。

基于此,中国政府高度关注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并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要实现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更是在各级政府的施政纲领中一再被提及。

但从2011年的情况看,今年居民收入要全面跑赢GDP难言乐观。从统计数据来看,2011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9.6%,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3.7%,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6%。

事实上,在2005至2010年,除极少数年份,居民收入增幅绝大多数情况下低于GDP增幅。

“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消费就上不来;收入分配问题改善了,消费下降的趋势才有可能遏止。”王小鲁说。

深化政府管理体制 改革

“贫富差距问题跟主要的经济结构出现偏差有很大关系。目前的核心

问题是在城市化这个大的背景下,土地问题和贫富问题这两个大的问题出了大的偏差。”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说。

学者分析,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核心在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领域都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在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收入尤其是中低级劳动者收入增长过于缓慢,居民收入与政府、企业收入相比增长缓慢,垄断收益与资源收益被极不公平地分配。

在再分配领域,部分财税政策导致了财富的逆分配,本来应该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反而导致了差距的扩大;社保制度不完善,农民工等最需要社保的低收入者往往没有覆盖在内,社保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再次发挥逆调节作用。

为此学者指出,明年是政府换届之年,很难预计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个复杂的难题上有多大的推进,但可以肯定的是,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来解决收入分配这个问题,否则拖得越久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伤害就越大。

王小鲁认为,腐败和制度不健全导致的收入分配格局被扭曲是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王小鲁2010年的研究,中



国居民未计入统计的“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元,导致中国实际收入差距大大高于统计数据显示出来的收入差距。此外,现行土地出让制度使得高达数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游离在预算之外,成为地方政府补充财政收入不足的一大来源。由于缺乏监管,这部分收入的使用相当随意,也进一步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

为此,王小鲁建议,根子上是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如此方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

而从具体操作上看,无论是着眼于宏观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还是致力于保证劳动者增收的《工资条例》,都是历经五六年甚至更久的酝酿至今难产。

“这些方案出来之后能对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起多大的作用都还很难说。但是迟迟不出来却传递出一个信号,说明解决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但是,不管怎样,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什么退路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经济学者坦言。

(摘自《东方网》)

报告称中国行业收入差距 4.2:1 金融业工资最高

当前我国工资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行业企业间差距、城乡间差距、地区差距、高管和普通职工差距,这四方面的工资收入差距近年来都在不断扩大,应引起社会重视。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人感到当前工资收入差距大。差距大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造成工资差距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12月1日,第四届中国劳动论坛在京举办。此次论坛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主题,从劳动关系、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展开交流研讨。

论坛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公布了相关报告。

4个方面差距扩大

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副所长杨黎明介绍说,改革开放初期,工资改革的重点是打破“平均主义”。现在,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的工资分配体制初步建立,但面临临的问题,就是工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差距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行业、企业间工资差距扩大。2010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36539元;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20759元。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70146元;最低的农林牧渔业,16717元。最高与最低之比为4.2:1。上世纪80年代,我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1.6—1.8倍左右。世界上多数国家行业间差距在1.5—2倍左右。企业间工资差距更大。2010年调查上海某银行员工工资及奖金人均29.66万元,员工的其他福利人均6.08万元,合计35.75万元,是当年城镇单位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10倍。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5919元,二者之比达3.23:1。1990年,这一比例为2.2:1。世界上多数国家这一比例在1.6以下。

地区收入差距扩大。2010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上海市为66115元,最低的黑龙江省27735元,最高最低之比为2.38:1。1990年我国地区间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比为1.84:1。

企业高管薪酬与普通职工收入差距扩大。据统计,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2010年为66.8万元,是当

年全国平均工资的18倍多。而部分私营企业、简单劳动者的工资偏低。2010年,城镇私营单位中的住宿餐饮业、农林牧渔业、公共管理社会组织三个行业中就业人员月均工资收入在1461元以下,不到城镇单位企业在岗职工的一半。

5种因素造成差距

决定工资差距的深层次因素是什么?差距是不是就意味着不公平?杨黎明认为,当前工资收入差距大,已成为一个社会热点,不可掉以轻心。现实中存在的种种工资收入差距,客观上是由多种因素多种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一,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有差别,这是决定工资报酬水平及工资差距的核心因素。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复杂劳动、生产流程中责任大的岗位等往往工资报酬要高一些。

其二,商品市场及价值规律会对劳动差别产生放大或缩小的扭曲作用。比如经济效益好的企业中的员工可能工资会高一些。

其三,人力资源市场会对工资产生调节作用,供大于求的劳动者劳动力价格会偏低,供不应求的劳动者劳动力价格会偏高。

其四,生产要素市场的调节作用也不小。在强资本弱劳动的时代,资本要素在财富分配中所得份额的比例相对较多,劳动要素在财富分配中所得份额相对较少。

其五,国家收入分配制度政策大环境会起导向作用。一方面要反对平均主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一方面要警惕贫富分化,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通常认为,“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这个决定工资的核心因素是分配原则的客观基础,而国家收入分配的大环境则是可变的。

政府调控不可或缺

合理的工资收入差距有利于激励劳动者提高劳动效率,不合理的差距会激化矛盾。当前中国的工资差距过大,一是与历史比较差距扩大速度较快,二是与市场经济国家比较,行业、地区间的差距偏大。当前我国人力资源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还不成熟,成为造成我国工资拉大的制度性原因。因此,杨黎明认为,在此阶段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

政府作为制度的设计者,要夯实收入分配的体制基础。包括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在国企改革完善工资管理体制,在非国有企业构建工资协商、劳动者民主参与机制。政府作为市场调节的修正者,应有针对性地对市场实施反周期调节、逆向调节。比如,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资本短缺、就业压力大,政策因此向资本倾斜。当前,则需要对人力资源市场中的弱势群体,比如简单劳动者增加保护。因为供大于求的普通劳动者总是处于劣势地位,任由市场调节工资水平会偏低,需要政策采取适当保护。

此外,对一些周期性特征明显的行业,政府需要运用税收杠杆和收入政策实施反周期调节。

(摘自《人民网》文/白天亮)



购房者不愿买房 开发商不愿买地 楼市双观望加剧

近来多个城市纷纷出现土地拍卖流拍,底价成交更是成为“主流”。记者调查发现,频频遭受质疑的房价“假摔”声正逐渐消去,楼市开始显露“真降”痕迹。

房地产企业拿地谨慎与购房者持币待购“双观望”情绪进一步加剧,可能对未来一两年内房屋供给产生一定影响,增大房地产调控阻力。

土地拍卖市场冷清

11月2日,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公告出让的1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9宗因无人申请购买而流拍,另外2宗土地则以底价成交。从出让公告看,这9宗地都位于济南长清大学科技园片区,包括4宗商业金融业用地和5宗居住用地,总面积约855亩。

此前,济南于10月28日出让的13宗土地,也是以底价成交。据了解,从8月份以来,济南一共成交34宗土地,其中大多数都是以底价成交。

进入下半年以来,昔日热闹的土地竞拍场面已经鲜见,转而变得冷清起来,底价成交甚至频频流拍,在部分城市呈现出蔓延之势。成都市近日拍卖五块土地,其中2块流拍,3块底价成交。武汉市今年下半年举行的两次土地挂牌拍卖会上,多数地块

以底价成交,竞价地块屈指可数。

南京市土地市场也跌入“低谷”。10月份南京举办的三场土地出让活动中,共推出16幅地块,最终只有7幅以底价成交,7幅土地延迟拍卖,1幅土地流标,1幅溢价仅1.9%。

楼市“双观望”情绪加剧

记者调查发现,无论是新开的楼盘还是正在出售的楼盘,都出现了看房人少、成交低迷的情况,而一些开发商表示近期已无拿地计划。专家表示,进入10月份以来,房地产市场出现购房者观望房价和开发商观望地价的“双观望”状态,土地一级市场和住房二级市场都处在以价格涨跌为中心的博弈中。

一方面是土地频频流拍和以底价成交,另一方面开发商和购房者“双观望”的情绪加剧,专家表示,这种局面如果继续维持,可能会给今后房地产调控进一步深入带来不小压力。

一些专家担忧,现在普遍出现的土地流拍现象可能给后期房地产市场调控增添新的阻力。原本应投入市场的土地因为流拍未能或延缓投入市场,这将使一年或一年半时间后的住房供给量减少,加剧刚性需求与住房实际供给之间的矛盾,从而为房价下行增添新的变数。

郭树清建议将 4 万亿养老保险金 住房公积金进行投资

12月15日,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出席财经论坛时建议,可以将全国近2万亿的养老保险资金和2亿多的住房公积金组织起来或者委托给一个机构,学习社保基金进行投资。

郭树清先表扬了社保基金的投资,称其年均9.17%的投资收益很不错。如果其他资金也能学习这种理念,会有很大好处。

他特别提及,明年社保方面改革会加快,城乡居民养老全覆盖、离

退休人员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水平也会提高。

“目前全国养老保险资金有2万亿余额,分散在各地,没有形成社保基金那样的基金,如果组织起来设立或者委托给一个机构,对所有省份和居民都大有好处。”郭树清如是说。

此外,他还提及“住房公积金累计缴存也有3.9万亿,其中1万亿贷出去,余额也有2万多亿。”

(摘自《财新网》)

从日元贬值历史 看人民币连跌

资源配置的不公平、低效率及其背后的腐败成本,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最大阻力,也是今天“外资看空中国”根源。正如《200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所指出的,公平在解释发展过程和制定政策方面都居于中心地位,“从长期看,增加公平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根本”。

上周,人民币对美元在即期交易市场已经连续8个交易日触及跌停。多位外汇交易员分析表示,现在市场买入美元的情况非常普遍。

与不久前公布的外汇占款数据四年首现负增长的现象相印证,人民币近日的屡次触及跌停板表明,外资看空中国的恐慌情绪正在蔓延。在过去近十年时间里,人民币逐步的升值过程,对应的是我国经济基本、出口以及房地产价格的高速增长。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放缓的趋势,而房地产调控触发了资本流出,再加上欧债危机的影响,使得贸易顺差推动人民币升值的力量也在减弱,正是在这些因素下,人民币汇率贬值风险正在加大。

在现代经济中,货币作为一种资产,其价值不仅取决于它的实际购买力,也取决于对它的未来预期收益。从表面上看,“人民币四连跌”及其背后的“外资看空中国”,在于投资者对中国经济成长的信心丧失,但是,其根本原因,则是对我国未来经济甚至政治结构改革的担忧。当前,以房地产来推动经济增长已难预期,在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以及外部形势很不乐观的状况下,出口导向型经济也逐渐失去了足够的拉动力。未来我国依靠什么来保持经济活力?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有一名委员曾指出,在应对危机、避免经济硬着陆方面,中国手上还有很多牌,“最大一张牌是改革”,改革本身就是释放生产力、创造就业和机会。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但关键的问题是,改革是一项风险型的决策。改革越往纵深推进,其难度就越大。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改革已经把好改的都改了,现在只剩一堆骨头。改革者也是理性者,大多数并不愿意去碰这块“硬骨头”,而更习惯于用发展去掩盖已有的矛盾,用增量去调整现有的利益格局。当增量式改革越来越难以为继,做大“蛋糕”面临瓶颈的时候,怎么公平地分配就提上了议程。

日本在上世纪末以来,日元也面临贬值的压力。究其原因,是日本泡沫危机以后的经济低迷,但其根源,则在于日本政治、经济的二元结构。麦肯锡(Mckinsey)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日本工业最优秀部分其生产率高于国际竞争者20%,但这些行业仅占GDP的10%,而占GDP90%的非出口部门(主要是受到政府保护的国内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率水平要比美国的同行低63%。这种二元经济现象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在非出口部门国会议员的干预下,银行部门贷款主要向效率低下的国内制造业和服务业倾斜。

在蛋糕能够做大的增量式经济发展中,这一问题并没有立刻凸显出来。但伴随日元汇率的提高,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受挫,这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就成了一根“难啃的骨头”。但显然,放开非出口部门的保护势必损害某些部门的利益。形势的不容乐观作用于市场上,直接降低了投资者对于日本经济未来的信心,日元贬值就顺理成章。

目前,我国经济同样面临一个二元式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比如,广大中小民营企业为出口、就业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是,不管在市场准入、税收还是在金融资源的获得上,都面临各种挤压;而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则不仅能够凭借垄断地位获得超额利润,还可以优先获取金融资源,享受政府各种补贴。资源配置的不公平、低效率及其背后的腐败成本,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最大阻力,也是今天“外资看空中国”根源。

(摘自《羊城晚报》文/萧仿)